

中国援非农技专家角色分析

——以中国援非农技组派遣项目为例

陆继霞 李小云

摘要 通过对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和国内相关项目管理人员的访谈,以及对项目相关政策、文件和媒体报道等二手资料的分析,本文试图理解中国援非农技专家作为“龙的礼物”之一,在构建中非关系的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从而探析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对外援助领域的根本差异。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在援非工作实践中除了完成个人的利益诉求,其所扮演的角色还呈现出非职业化、高度政治化和去个体化的“国家代理人”特征。这一角色所赋予的内涵远远超过农业技术本身,而在文化、政治等维度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含义,这与美国、英国等传统援助国农技专家的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在现实中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有效性。

关键词 中国援非 农技专家 农业援助 国家代理人 中非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

* 陆继霞,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北京 100193)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最早始于1959年首次向几内亚提供无偿的粮食援助，此后一直延续至今，其中从1961年第一批开始，派遣农业技术专家的实践贯穿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整个过程。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标志着中非农业合作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向非洲派遣高级农业技术专家（也称“援非百名高级农业专家”），也成为中国政府援非“新八项”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技专家作为中国对非农业援助重要的微观主体，在现实中对构建中非农业合作关系、提高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有效性、改善非洲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户生计，以及提升中国在国际对非援助体系中的地位，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国际发展领域的技术专家，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同其他国家的技术人员一样，掌握着某种专业（如农业、林业）技术，是典型的技术人员，一般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指导工作，与职业化的“发展专家”相比，他们呈现出高度技术化的特点。然而，与大量文献集中讨论中国援助非洲农业的动机、管理模式、方式和有效性等方面相比，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援非农技专家的角色、作用和影响的研究与讨论仍然有限。因此，本研究通过2014年7—11月间对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的农技组专家进行实地调查、对农业部农技组专家派遣项目的管理人员和一些执行完成任务回国的援非农技专家进行访谈，并在查阅一些援非农业专家的日志、书籍及项目相关政策和文件的基础上，试图理解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在中国对外援助实践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又是如何扮演这种角色的。进而，论文还希望探讨如何通过改进派遣农技专家项目来进一步提高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有效性，在促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好地完善自身援助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在国际援助体系中的参与和竞争能力，对世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中国援非农技专家派遣项目概况

农业一直是中国对非援助的重要领域。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就曾提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① 长期以来，中国强调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② “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③ 中国对外援助采用的是与国内一致的管理框架，即由国家统一配置资源的“国家控制型管理模式”。^④

中国向非洲国家派遣农业专家组最早始于 1961 年，当时，中国向马里派遣了首批 7 名农业专家试种茶树和甘蔗，^⑤ 其后一直延续至今。1964 年，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中共中央于是决定将对外农业技术援助列入农业部门的重要议程，并形成机制化的对外农业技术援助项目。^⑥ 从此，中国向非洲派遣农业专家便与其他农业基础设施的援助项目相配套。尤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台湾当局在非洲国家的农耕队撤出后，^⑦ 中国继续向非洲 25 个国家派遣了 670 名左右农业专家为其提供农业技术支持，^⑧ 作为对非洲国家政治支持的回报。在这一阶段，中国向非洲派遣农业专家的主要

①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12 日，第 1 版。

② 参见《中共中央批转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1958 年 10 月 29 日，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09/10/content_26746901.htm。

③ 参见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年。

④ 唐丽霞、李小云、齐顾波：《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管理模式的演化与成效》，《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6 期。

⑤ 王成安：《中国援助非洲 50 年概述》，载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52 页。

⑥ “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对外农业技术援助工作的报告”，1964 年 5 月 25 日，甘肃省档，档号 91-7-432-2，第 1222—1226 页。转引自蒋华杰：《农技援非（1971—1983）：中国援非模式与成效的个案研究》，《外交评论》，2013 年第 1 期。

⑦ 20 世纪 60 年代，李国鼎策划并推动了台湾省的宏观经济建设计划，积极开拓国际经济合作，并在合作计划下派遣农业技术团队赴非洲提供技术协助。参见王骏、李国鼎：《技术官僚与台湾的现代化》，《科学文化评论》，2009 年第 5 期；蒋华杰：《农技援非（1971—1983）：中国援非模式与成效的个案研究》。

⑧ Xiaoyun Li, Dan Banik, Lixia Tang and Jin Wu, “Difference or Indifference: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Unpacked”, *IDS Bulletin*, Vol. 45, No. 44, 2014.

特点是“政治挂帅”，即通过国家高度控制和选择的政治动员方式，进行严格的“自上而下”的选拔。“援外被看作是政治任务”，强调“政治第一”。^①在此援非框架下，对农业技术专家选拔的要求则是“（政治上）又红（技术上）又专”，对其管理依靠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选拔尤其注重考察被选派技术人员的政治表现和家庭背景，有时甚至可以重视到忽略其技术水平的地步。换句话说，在“又红又专”的候选专家人数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做不到两全其美，则宁可牺牲技术，也不能牺牲政治。^②在当时的中国，单位作为国家秩序的基础细胞，^③负责个体家庭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过程，因而，当“专家”被组织选中后，个人是没有权力选择的，需要绝对服从政府和组织的安排。在国家高度的政治动员和组织下，中国大陆的农技专家通过践行自办公助、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潜质的合作社、推行农业“八字宪法”、传播“大寨精神”等措施，力图在非洲建立起与中国大寨高度类似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而证明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优越性。^④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对外援助大幅减少，^⑤中国农业专家也相应地从非洲国家撤出了一段时间。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与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非农业援助进入全面改革期，中国向非洲国家派遣农技专家项目得以重启，且带有市场经济的特点，从以前重视派遣专家的数量转变为注重质量，更加注重受援国的需求和受益情况。此外，动员方式也由组织上“自上而下”的选拔变成了鼓励“自下而上”的自愿报名。^⑥但这种项目动员机制仍然严格将

① 周弘：《中国援外6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② 笔者于2014年12月对20世纪80年代援外农业技术专家汪先生的访谈。当时，由于过度强调以政治身份为标准选拔专家，所以忽略了技术层面，出现了一些专家不能指导当地农业技术的问题，这个技术能力问题在80年代显得尤其突出。

③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④ 蒋华杰：《农技援非（1971—1983）：中国援非模式与成效的个案研究》。

⑤ J. Van de Looy and L. J. de Haan, “Africa and China: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0, No. 3, 2006, pp. 562-575.

⑥ 卢琰：《分类的迷思：中国的援非农业专家是“发展专家”还是“技术人员”？》，《国际发展时报》（IDT），2015年7月25日。

农技专家的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并要求其道德品质、业务技术和身体条件都非常优秀。^①

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举行，开启了中非国家之间新的集体对话机制，尤其是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标志着中非农业合作进入新的阶段，向非洲派遣百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也称“援非百名高级农业专家”）作为“龙的礼物”^②，也成为中国政府援非（新）“八项政策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2008年9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大会上宣布，在接下来的5年里，中国将派遣1000名农业专家，并建设3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中国为3000人提供农业培训课程。^③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又宣布，“未来三年内，中国政府将向非洲派遣50个农业技术组”，^④以提高非洲实现粮食自足的能力。在接下来的2010—2012年间，中国向非洲派出了206名农业技术专家，除了人员数量增加外，专家实地调研和试验示范的预算（之前只有专家的津贴补助）也增加了。^⑤

表-1 中国“援非百名高级农业专家”第一批入选名单（2009—2010）

序号	省份/机构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
1	江苏	李荣刚	男	江苏省农业环境监测与保护站	推广研究员
2	江苏	申义珍	男	江苏扬州市农业局环境监测站	推广研究员
3	江苏	徐 卿	男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林业技术指导站	高级工程师
4	广西	李 平	男	广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总站	高级农艺师
5	广西	莫海南	男	广西平南县农业局信息中心	高级农艺师

① 王成安：《中国援助非洲50年概述》，第166页。

②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③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s Speech at UN High-Level Meeting on MDGs”, New York, September 26, 2008, http://english.gov.cn/2008-09/26/content_1106949.htm.

④ 《温家宝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人民网，2009年11月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0338993.html>。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人民出版社，2014年。

(续表)

序号	省份/单位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
6	广西	孔祥明	男	广西靖西县农业局	高级农艺师
7	广西	黄玉溢	男	广西农业科学院	高级农艺师
8	广西	黄日保	男	广西柳州市农科所生物工程室	高级农艺师
9	辽宁	席海军	男	辽宁省朝阳市农村经济委员会蔬菜服务站	高级农艺师
10	辽宁	于向阳	男	辽宁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高级工程师
11	广东	欧计寅	男	广东省农业厅农业环保与农村能源总站	高级农艺师
12	重庆	郝 风	男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高级农艺师
13	重庆	肖仁荣	男	重庆市南川区畜牧兽医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级兽医师
14	重庆	董志华	男	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水利局	高级工程师
15	安徽	杨前进	男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16	福建	谢特立	男	福建省种子总站	高级农艺师
17	四川	刘 健	男	四川省广元市农业局农技推广站	高级农艺师
18	四川	卢远华	男	四川省自贡市农业局植保站	推广研究员
19	四川	马 健	男	四川省达州市农业局土壤肥料与生态建设工作站	高级农艺师
20	湖北	张 俊	男	湖北省荆门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高级工程师
21	湖北	许金泽	男	湖北省潜江市农技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22	湖北	周 俊	男	湖北省随州市种子公司	高级农艺师
23	湖北	洪海林	男	湖北省咸宁市植保站	高级农艺师
24	湖北	涂修亮	男	湖北省咸宁市科技局	副教授
25	甘肃	刘广才	男	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高级农艺师
26	湖北	慕 平	男	甘肃农业大学农学院	副教授
27	内蒙古	马宇龙	男	内蒙古巴彦淖尔草原站	高级畜牧师
28	湖南	戴振炎	男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水产系	副教授
29	湖南	肖秀娥	女	湖南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30	河南	吉进卿	男	河南省畜禽改良站	高级兽医师
31	天津	刘建文	男	天津市禽病诊断培训中心	高级兽医师

(续表)

序号	省份/单位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
32	全国畜牧总站	刘晓辉	男	全国畜牧总站协会工作处	副译审
33	中国农业大学	康定明	男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教授
34	华中农业大学	周德翼	男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35	华南农业大学	李之林	男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作物生产系	教授
36	华南农业大学	刘桂富	男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副教授
37	中国农垦总公司	石金贵	男	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海外开发部	副教授

资料来源：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http://www.cicos.agri.cn>，2007年12月14日。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根据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文件，将继续将派出农业技术专家组（农技组）作为中国援助非洲农业的重要措施。截止到2016年6月，中国已经向25个国家派遣了1039名农技专家。^①

三、中国援非农技专家的角色特征

那么，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在中非农业发展合作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具有哪些特征呢？通过分析中国援非农技专家的选拔和国家对该群体的管理过程，以及农技专家在非洲国家的具体实践活动，本文发现，中国援非农技专家作为代理人呈现出非职业化、高度政治化以及去个体化的显著特征。

（一）非职业化的身份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向非洲派遣农业专家的项目是连续的，但具体形式（名称）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从“农业专家”到“百名高级专家”再到“农技组”等不一而足。并且，作为中国形象代表、中国农业技术的

^①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唐盛尧2016年6月26日在“中非农业合作助推非洲农业现代化”会议上的发言。

“使者”，援非农技专家的选拔过程一直非常严格。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中国援非农技专家这一特定身份群体的产生，到当今援非农技组的存在和延续，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个职业群体，而是由国内一些部门的在职人员临时性充任。那么，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人员是如何成为援非农技专家的呢？

研究发现，援非农技组专家派遣项目涉及多个行政部门，包括中国驻非洲国家使馆经商参处以及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商务部、地方省（市）农业部门等。项目的具体运作程序是：（1）非洲国家对派遣专家的数量和专业提出请求（包括专家类型、数量、专家的背景和资历等），并提交给中国使馆经商参处。（2）经商参处将其意向转给商务部对外援助司（援外司）。如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专家派遣基于埃方提出的专家需求，其中包括水稻和棉花专家、作物收成后管理专家、蘑菇培育技术专家、机械技术专家、木材解剖专家、树种实验室专家、人工林发展专家和竹材利用专家各1名（共8名）。（3）商务部援外司随后协同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经合局）和农业部国际合作司一起，请农业部国际交流中心制定具体派遣农技组的实施方案，待商务部批准后，再由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协调国内地方农业部门进行选拔和派遣，期间农业部国际交流中心需要同时向商务部经合局报送专家材料进行备案（包括专家的调整等），而中国驻非洲国家使馆经商参处则负责安排专家日常工作和生活所需（包括租房、购买车辆等）。^①

中国援非农技专家的选拔和派遣工作具体由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负责。该部门每年按照“援非高级农业专家国别派遣方案”，确定每年度派遣专家的人数、专业和派往国家后，通过有关省（市、自治区）农业行政系统、与农业相关的大学、大型农业集团企业及农业部内部行政、事业单位发布信息，同时在农业部和商务部的网站上公布相关信息。在个人自愿和所在单位同意的条件下，符合条件的专家将被各有关单位进行组织推荐。

报名完成后，组织单位将从政治素质、外语和业务能力三个方面对报名

^① 依据笔者于2015年10月对农业部相关项目管理者的访谈整理而成。

人员进行严格初审,然后将初选结果以及初选专家材料一同提交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① 报名组织单位对每个岗位的推荐人选原则上不超过 2 人。农业部和商务部两部收到初审名单后,随即成立专家评审小组,对推荐的专家人选进行评审和面试(有时候通过电话进行),确定外派专家名单,并对各组织单位下达外派专家名单及任务通知。有的年度“全国近 2000 人报名,得到面试机会的才 300 人,最后确定 100 名专家”。^② 接下来,这些外派专家需要与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签订服务协议,并以农技组为单位被派往指定的非洲受援国家。在工作期间,农技组必须以团队为单位每个月向项目执行单位(农业部国际交流中心等)汇报其工作进展。

以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农技组专家为例,他们虽来自不同省市的不同工作单位,但在 2012—2014 年间,他们在同一时间加入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的农技组,成为一个工作团队。按照项目选拔的标准,他们都必须首先具备“政治素质好,愿意为中非农业合作积极工作”的共同特点,于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部门、不同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农业技术人员此刻被赋予了援外农技专家的共同身份。

表-2 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农业技术专家组名单(2012—2014)

	援助专业	姓名	性别	国内工作单位	职称
1	水稻	申 * *	男	江苏省扬州市 * * *	推广研究员
2	棉花	李 * *	男	河北省高碑店市 * * *	高级农艺师
3	作物加工	刘 * *	男	河北省逐鹿县 * * *	农艺师
4	蘑菇	王 * *	男	河北省承德市 * * *	推广研究员
5	木材机械	谢 * *	男	甘肃省白银市 * * *	农艺师
6	木材解剖	周 * *	男	四川省广元市 * * *	副高级
7	热带人工林培	何 * *	男	四川省广元市 * * *	高级工程师
8	竹材加工	胡 * *	男	江西省南昌市 * * *	高级农艺师

^① 包括报名组织单位推荐函、通过初选专家总名单,以及每位专家的报名表、工作学习简历、最高学历和学位复印件、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复印件及每人两张 2 寸彩照。

^② 马宇龙:《飞向撒哈拉——我的援非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年,第 2 页。

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参加项目的期限通常为一年（少数国家为两年，如埃塞俄比亚）。在援外工作期间，农技专家一方面可以保留在国内工作单位的职位，并按时按标准领取工资，另一方面还可以获得援外工作的技术服务补贴。尽管在非洲工作期间，这些专家在外界眼中具有共同的援非农技专家身份，但在参与项目之前他们就清楚地知道，在完成任务回国后，他们会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继续从事以前的工作。也就是说，中国援非农技专家无法像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传统援助国的技术专家那样，成为职业化的发展专家，他们在非洲的一年或两年的工作与生活，对于他们在国内的固定身份和职位而言，只是暂时性的离开。在国内单位的身份既是他们进入援外项目被选为农技专家的前提基础，又是他们在结束援外专家工作后的归宿。恰如农技专家刘晓辉所言，“正是有这样的书面保障，专家们才可以专心地援非，而不是在与非洲农民打交道时还想着自己退役后的‘饭碗’问题。”^①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援外农技专家尚未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成为这些专家未来的发展路径，而且短暂的援外专家的工作经历也不会或很难对其国内的职业发展前景带来直接的、明显的效用，如有的专家就谈到，“援非经历对国内单位评职称没有任何作用”。^②

（二）高度政治化的管理

如前所述，中国援非农技专家自参加项目之始，国家就赋予其身份以承担中国农业技术转移的重要角色，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中国援非农业项目，中国将国内“农业八字宪法”和“大寨模式”等引入非洲国家时就可见一斑。但与此同时，援非农技专家所承担的政治任务也不容忽视，这一点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专家个人而言，在某种情境下甚至还要高于技术本身。

出国前，被选拔的农技专家要参加商务部和农业部联合组织的行前培训，其内容包括“外事纪律和外交礼仪、工作职责、语言、受援国风俗习

^① 刘晓辉：《心版上的津巴布韦——我的农业援津手记》，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第200页。

^② 笔者于2015年7月对援外农技专家组李专家的访谈。

惯、生活能力等”。^①另外，为了欢送这些农技专家，商务部、农业部等部门还会联合举行出征仪式。援外专家赵荣华回忆其与农业部领导一起共进午餐时，曾被鼓励“要不辱祖国重托和使命，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宗教、民俗民风，把我们文明之国的优秀品质和风貌带出去，努力工作，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为受援国多做贡献，同时也要成为传播和缔结中非友谊的使者”。^②几乎所有被访谈的援外农技专家都称，自己在出征仪式上能够强烈感受到自己从技术员^③华丽转身为“援非农技专家”是一件非常荣耀和值得自豪的事情，参加这个项目是“为国争光”。对于农技专家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变化，更是一种政治地位的提升。申专家在被访谈时称：“参加农业专家项目是很有荣誉感的”，^④赵专家在其“民族志”^⑤中则提到，“领导的一席话令人鼓舞，使我们信心满怀。同时也感到祖国的嘱咐和民族的重任都寄予在我们身上的千钧重量。”^⑥在这些农业专家看来，其身份是一种使命的象征，因而“为国争光”始终是其在非洲从事援助工作时的宗旨，申专家在访谈中所称的“不能给中国人丢脸”^⑦是大多数援非农技专家在非洲工作中的座右铭。

援非农技专家除了在出行前接受上述各种高规格的待遇之外，在抵达非洲受援国后，当地中国使馆经商参处也会高调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的交通与住宿。据赵荣华在其“民族志”中回忆，在到达目的地参加经赞处人员的宴请时，参赞对其表示“希望我们为埃塞的园艺产业做出优异的成绩，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⑧他个人则表示，“备受鼓舞，信心满怀”、

① 参见农业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派遣援埃塞俄比亚农业技术组项目实施方案》（2012年1月17日），内部材料。笔者于2015年10月访谈农业部相关项目管理者时所得。

② 赵荣华：《民族志——在东非高原古国埃塞俄比亚的援外工作点滴拾贝》，会议材料，中国专家眼中的非洲农业发展问题研讨会，北京，2012年1月13日。

③ 这些援非农技专家的选拔面向各省市与农业相关的诸多单位，但事实上，真正报名较多的是县级单位的技术推广人员。

④ 笔者于2014年7月对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农技组申专家的访谈。

⑤ 该“民族志”并非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而是农技专家根据自己在非洲工作经历写就的类似日记的文本。

⑥ 赵荣华：《民族志——在东非高原古国埃塞俄比亚的援外工作点滴拾贝》。

⑦ 笔者于2014年7月对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农技组申专家的访谈。

⑧ 赵荣华：《民族志——在东非高原古国埃塞俄比亚的援外工作点滴拾贝》。

“作为一名援外高级农业专家，深切地体会到总书记对非‘八项举措’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援非工作的重要意义，始终铭记祖国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肩负的援非重担与使命，不仅要做一名业务熟练的科技工作者，而且也要做一名播撒爱心、传递友谊的使者。尽自己所能将我国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传授给受援国，踏踏实实、勤奋工作，在本职工作和岗位上较为圆满地完成祖国赋予的光荣任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使中非友谊绿树得以常青、源远流长。”此外，在访谈中农技专家们也称，除了日常生活关照之外，政治思想和觉悟是他们和援外管理人员交流话题的主旋律。

空间性的纪念场所和时间性的纪念日，是塑造政治文化以及培育、规训和展现国民性的重要方式。^①除了通过上述出国前的宴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出征仪式等培养专家群体的政治信念和身份认同外，^②在非洲工作期间，每逢重要的节日，援非农技专家还需要参加中国驻非洲国家使馆经商参处组织的一些活动，接受集体主义教育。例如，“在坦桑尼亚刘大使的带领下，清明节祭扫中国援坦桑尼亚烈士陵园，悼念69位长眠于此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专家组专门组织到（中国援助的）坦桑尼亚火车站参观，亲身感受援非先驱们的伟大功绩，激励自己搞好援非工作。”^③

由此可见，中国农技专家作为国家形象和农业技术的代理人，在到达和居留非洲国家期间，通过接待酒宴等仪式性活动，其专家身份的政治性得到延续、巩固和强化。^④

（三）去个体化的工作实践

按照中国与非洲受援国之间的协议，中方各部门并没有给农技专家布置具体的工作任务，而是由受援国提出要求，为不同专业的专家分别下发工作任务书（TOR）。在非洲国家对农技专家的要求中，突出强调专家要在

^① 王海洲：《政治仪式的权力策略——基于象征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学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② 卢琰、李小云、陆继霞：《角色视角下的中国援非效果再考察：中国援非专家的身份认同》，《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7年第1期。

^③ 许金泽：《对非援助民族志》，会议材料，中国专家眼中的非洲农业发展问题研讨会，北京，2012年1月13日。

^④ 刘晓辉：《心版上的津巴布韦——我的农业援津手记》。

转移中国农业技术、为当地解决实际问题以及为当地员工进行培训、加强能力建设等方面作出贡献。^①

尽管农技专家们参加中国援非项目的动机各异，包括增加收入、开阔视野、为国争光、实现个人价值以及对异域的向往，甚或增加政治升迁资本等，^② 他们的专业背景也存在较大差别，但几乎在所有援非农技专家眼里，非洲国家都是充满希望的异域。“非洲土地资源丰富、气温高，自然林果业丰富，比国内的贫困山区（发展基础）好多了。”^③ 他们认为，作为中国农业技术的使者，自己能够给非洲国家带来新的技术、廉价且便于操作的农具、新品种以及中国成功的农业管理理念。他们还认为能够通过自己作为微观主体的实际行动，传播中国农业文化，增加中国农业技术在非洲的影响力，搭建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平台，增进中非友谊。^④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工作难度甚至比国内更大。^⑤ 至于具体如何开展工作，他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这种情况下，“援非人员必须融入当地社会，融入当地文化”，“必须不惧艰苦、不辱使命。援非专家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必须与对方人员真诚合作，获得对方国家的信任与支持”。^⑥ “虽然国家没有给我们提具体工作和硬性要求，主要是根据受援国情况决定工作内容。但他们经费又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为了不给中国人丢脸，我们也争取做得最好。”

① 笔者于2014年11月对埃塞俄比亚农业部项目官员的访谈。

② 刘晓辉：《心版上的津巴布韦——我的农业援津手记》，第199页；陆继霞、何倩、李小云：《中国援非农业专家派遣项目的可持续性初探》，《世界农业》，2015年第4期。

③ 2012年1月13日在金码大厦召开的“中国专家眼中的非洲农业发展问题研讨会”上罗专家的发言。

④ 笔者于2014年7月对援助埃塞俄比亚农技专家组李专家的访谈。

⑤ 在访谈中多数援非专家表示，这些困难包括：受援国政府动员能力弱、工作效率低、配套条件差，没有充足的经费激励其对接人员配合中方专家的工作，人身安全和健康（如疟疾）风险高。

⑥ 帅启富：《中非农业合作需要有实质性的参与》，会议材料，中国专家眼中的非洲农业发展问题研讨会，北京，2012年1月13日。

农技专家的身份与知识联系紧密,^①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更多是在与当地合作伙伴和农民的互动实践中获得的。在有限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援非农技专家凭借个人在国内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创造条件”开展品种示范和农民培训等活动,例如,与当地中国援助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进行合作开展农民技术培训,是援外农技组专家通常采取的一种方式。当遇到受援国给自己提出未知的农业技术问题时,便通过上网或与国内同事联系等方式查找资料解决。如援助埃塞的李专家称,在他援非期间,受援国曾提出一个关于某种“棉花病虫害如何去除”的问题,当时他自己并不懂该技术、没有经验,但是,他绞尽脑汁,通过网络搜索以及与国内同事进行联系和咨询等各种方法,最后解决了该问题,因而被地方官员和农民所认可。

在中方项目经费有限、受援国经费也不足的情况下,^②中方专家尽量“能做些什么就做什么”。^③为了在非洲对中国农产品进行试验和示范工作,专家们利用自己住处房前屋后的空地种植蔬菜、培育作物秧苗等,并把试验记录下来。“在非洲,会什么就教什么”、“会什么,就做什么”成为中国农技专家描述其在非洲工作实践时的自白。专家许金泽“豆浆打败咖啡”的故事^④或许可以佐证这一点。其实,专家们在工作中更加重视中国农业技术在非洲国家的平移,而非对当地农业技术和知识进行改造,他们更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各种办法解决非洲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为国争光,得到工作伙

① Bina Desai, “Inside out: Rationalizing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David Lewis and David Mosse, eds., *Development Brokers and Translators: The Ethnography of Aid and Agencies*, Kumarian Press, 2006, p. 186.

② 埃塞专家的标准是每人每年950美元工作经费。

③ 笔者于2014年7月对援助埃塞俄比亚农业技术组李专家的访谈。

④ 援助坦桑尼亚农技专家许金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当地人爱上了大豆和豆浆。100多年前,为拯救坦桑尼亚饥民,德国传教士将大豆引进坦桑尼亚,他们把大豆煮熟后发放给灾民,教他们种植和食用方法,但坦桑尼亚人并没有真正接受大豆及其食用方法。坦桑尼亚建国后开始研究多种大豆食用方法,主要是把大豆与小麦、大豆与玉米按不同比例混合,然而老百姓也没有接受自己开发的大豆食用方法。后来,中国农业专家带去了豆浆机,并为当地人民所喜爱和接受。原来周边的朋友工作之余都是喝咖啡,后来改为喝豆浆,中国专家的到访使他们办公室刮起了一股豆浆风。经济条件好的居民,可购买中国家用豆浆机,边远农村地区则可以推广廉价手摇豆浆机。如果每个农村家庭种上1—2亩大豆,每天喝一杯豆浆,那么坦桑尼亚38%的人口营养不良的现状将很快得到改善。许金泽撰写的《坦桑尼亚大豆发展战略》正式出版,大豆生产也开始得到坦桑尼亚政府的重视。参见许金泽:《对非援助民族志》。

伴、同事以及国内管理部门的积极评价。这些具有农技推广背景的援非农技专家，事实上转换的不仅是“他们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谁”。在这些专家眼里，他们的知识代表的不是个人的技术水平和能力，而是中国的农业技术，他们的言行代表的是中国形象、中国文化，是中国对非洲的态度，而并非是个体的行为，非洲人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对中国技术的评价。因此，虽然这些农技专家的工作内容依据受援国所拟定的工作任务书，但其实际交往内容却远远超过了任务书本身。

为了让当地的官员和农民接受中国的农业技术，除了正式的工作交往外，中国援非农技专家还会尽各种可能去帮助身边的非洲同事或朋友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获得他们对中国人、对中国技术的信任。被访谈的李专家提到，他曾经把带到非洲（治疗感冒、胃病）的药物送给非洲同事，帮助其家人治病，有时候同事手头紧张向他借钱时，自己也会出手相助。一来二去，这类非正式交往多了，远道而来的中国专家们也与当地的农民成了“兄弟”。为了与同事和邻居融洽相处，农技专家们还会把自己种植的蔬菜等相送，增加与当地之间的感情交流。此外，李专家还称，当非洲合作伙伴的女儿结婚时，他还去参加婚礼，送上自己的贺礼。平日里两人一起在农业部对面的小咖啡屋共品咖啡更是家常便饭。日常生活中大量类似的非正式交往，为提升中国农技专家与非洲合作伙伴之间正式合作的融洽度和有效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虑到经费预算和安全，中国农技专家组在非洲工作期间统一住在由中国使馆经商参处租赁的同一栋房子里，各有独立的卧室和卫生间，厨房和客厅等则是共用的公共场所。每天上下班，他们需要共乘项目配备的汽车（每4人一辆车，出差除外）。^①虽然同在受援国农业部上班，但是由于分别来自中国不同区域和单位，专业也不同，因此上班期间专家之间交流的时间较少，当私人生活领域界限模糊时，更多的互动和碰撞便发生在每日生活起居的住宿场所。此时，专家的行为举止仍然受到同行和中国文化的约束，“即使

^① 按照受援国的要求，援非农技专家组办公地点都在农业部，但分散于不同的部门。

单身，我们也不能太随意，不能被其他中国人瞧不起”，“不想丢中国人的脸”，“我们每天上班都准时到，甚至提前一点儿，同样都是在农业部工作的，还有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援助专家，我们总不能比他们的专家差。虽然嘴上都不说，但我们心里都有数，不能让埃塞官员挑出咱们中国人的毛病。”^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援外农技专家组在非洲工作期间，其成员不允许携带家属随行，并且在正常情况下，参加一年期限项目的农技专家在服务期内也不允许回国探亲。如果是两年以上援非项目如援埃塞农技组，农技专家则每12个月有一次回国探亲的机会，但假期限1个月，且放假期间停发援外工作津贴。如果援非农技专家在参加项目工作期间，有家属需要从国内来探亲，则需要上报国家相关部门批准；^② 家属在非洲探亲期间，与农技组专家同住一个屋檐下也“十分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援非农技专家为了排遣“乡愁”、疏解长期离家的寂寞感，通常只能通过电话或其他网络视频软件与家人联系交流。

综上所述，中国援非农技专家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层面，都缺少其他国家技术专家的那种独立性和个体化的特征，尽管其有个体的行动空间，但更多是为了表征中国农业技术和文化层面，而不是为个体创造利益诉求，因而在实际上他们也无法成为英国、美国等传统援助国家同行那种意义上的代理人。中国援非农技专家作为个体，在现实中被国家所吸纳，成为国家的使者，是中国文化的载体。

四、“国家代理人”：中国援非农技专家的角色分析

作为一个职业性群体，技术专家在二战后西方世界创造的发展话语体系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英语学界，路易斯和莫斯对发展专家的分析极具影响力。他们指出，西方援助世界中的技术专家除了呈现出高度技术化的特点

^① 笔者2014年11月对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农技组李专家的访谈。

^②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没有上报获批而私自前往是不允许的。

外，还具有职业化、去政治化和个体化等显著特征。^① 相比较而言，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援非农业技术专家作为一种类型的发展专家，则呈现出非职业化、高度政治化和去个体化的特点。

作为独立的个体，“专家”在西方世界中是一种独立的职业，专家个体进入和退出这个群体都具有更高的自由度。而中国专家的选拔和产生是以国家的名义，对体制内的人进行选拔和管理。换句话说，在中国对外援助的体系中，非政府组织、双边或多边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独立的个体，从根本上就不具有申请参加援非农技专家派遣项目的资格，这与美国、英国、日本等传统援助国外援项目技术专家的职业化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由此一来，在中国援非农技专家派遣项目一系列标准化的选拔程序及相关部门的规训下，来自全国各地不同部门和单位的技术人员被生产和再生产为特定的“专家”群体，最终使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符号，而且更重要的是，成为一种政治符号。正如西方的发展援助在实践层面处处体现其自身的政治逻辑，中国的援助也体现了其国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逻辑。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实际上是中国国内发展方式在海外的延伸，^② 这一点在援非农技专家项目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西方专家由于国家的历史原因（宗教、殖民和文化等）及其对异文化的了解，在专家职业化的道路上个体的选择性较大、个体化明显，他们通过翻译的过程改变了援助的轨迹，结果是通过个体的行动形成了由援助者—被援助者—掮客三者所构成的结构性的援助体系。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建构一套发展的话语、知识体系和制度基础，使得在工作中解决问题变成“纯粹的”技术问题，而达到弗格森所指出的去政治化效果。^③ 而中国专家在非洲的工作过程中无时不凸显其政治性，相反却弱化了其技术本身。由于是从国

^① David Lewis and David Mosse, eds., *Development Brokers and Translators: The Ethnography of Aid and Agencies*.

^② Xiaoyun Li, Dan Banik, Lixia Tang and Jin Wu, "Difference or Indifference: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Unpacked", pp. 22-35; 唐晓阳：《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

^③ James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家体制内的技术员转换为援外专家，其工作目标主要是发挥示范作用，即示范中国的农业技术与中国文化，甚至有时候由于专家个体原因，“宁可不做事也不能做错事，这样不会给国家丢脸”，^① 结果他们在从事援外工作的一两年时间里并未能发展出个性化的东西。而且，国家通过上述一系列的仪式和管理程序，使得非职业化的专家在遭遇异文化后更倾向于依赖国家，顺应国家和政府的旨趣、完成国家的使命，从而大大降低了与政府目标产生冲突或去政治化的可能性。在“行政吸纳社会”（控制、替代、优先满足强者三种主要方式）的中国社会体制下，^② 中国援非农技专家技术服务的提供让位于政治表现的需求，由此而呈现出“国家代理人”的特点，这与传统援助国的技术专家表现出显著的不同（表-3）。

表-3 中国援非农技专家与传统援助国技术专家之比较

	传统援助国发展技术专家	中国援非农技专家
专家身份	职业化、技术化	非职业化、技术化
稳定性	流动性大，在不同的发展机构间进行职业流动	流动性小，国内某机构的固定职员
政治上	相对独立、个体化、去政治化	嵌入制度、去个体化、高度政治化
视野上	全球化视野、世界体系，非洲作为他者	地方实践，非洲国家作为兄弟
文化	利他助人视角，对贫困、脆弱地区和人口进行援助	兄弟、互助、互惠，更多看到相似性
身份认同	经纪人、翻译者，维护项目的存在和持续	中国农业技术转移的使者，传播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工作目标	长期工作于国际发展领域，专职的“专家”构成专家的核心，争取合同的连续性	短期、非专职的国际发展领域的专家，有自己的工作单位，争取表现好，“为国家争光”获得荣誉
日常生活	独居，上下班个体决定，相对自由	集体居住，上下班集体用车

① 笔者于2014年11月对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农技组专家的访谈。

② Kang Xiaoguang and Han Heng,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Society: A Further Probe into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Mainl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5, 2007.

综上所述，我们透过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专家派遣项目这一棱镜，呈现了中国援非农技专家不同于传统援助国技术专家的“国家代理人”特征。总结全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于个体来讲，中国援非农技专家派遣项目虽然是临时性的、非常规的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是为了特定的目标而设定的项目，但从国家层面来讲，它突破了科层制的层级性和区域性安排，在项目系统实施的过程中，国家治理逐渐确定了一种新的结构形态。^① 在具有连续性的德治体制下，^② 援外专家的选拔和派遣过程以及日常管理一直充满了浓厚的道德和政治色彩，其结果便是，中国援非农技专家虽远在异乡，但其实际行动始终严格地受到国家制度的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高度重合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从而将政治话语强烈地嵌入其以技术为特征的工作实践和话语之中，这与传统援助国的技术专家通过建构一套发展话语、知识体系和制度基础，将其在工作中解决问题变成了去政治化后“纯粹的”技术问题，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

在中国援非农技专家派遣项目中，通过从宏观到微观的项目管理过程和纪律、组织的形式，国家降低了农技专家在非洲工作实践中个体化因素的影响和发展，最终其行动更加倾向于顺从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及完成国家的使命。在高度政治化的、“行政吸纳社会”的国家体制的作用下，中国援非农技专家作为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不仅没有分离、反而是相互融合的。除此以外，由于在异文化中对国家（部门）的高度依赖，非职业化的中国农技专家在完成短期的项目任务后，无法发展出专家主义，演变为技术官僚，其非职业化的身份降低了他们自我选择的冲动和可能，而不得不在项目结束时如期退出“农技专家”的队伍和身份，从而他们终究也无法像西方发展专家那样，成为职业化、高度个体化和去政治化意义上的代理人。

中国农技专家作为发展工作者，其自身的角色认知、行动及动力都不同于美国、英国等传统援助国的技术专家，这从根本上源于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同文化、援助体系以及对发展和援助理解的差异。这些国家的专

①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② 周飞舟：《锦标赛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家所接受的教育不乏全球战略与框架维度，带有西方文化所谓“进步”的理念，到非洲工作具有某种“传教士”的意义，而中国专家则没有这种情怀。中国农技专家是在兴奋、期待和疑虑的状态下进入非洲大陆的，对于非洲的了解也多始于他们出发前的培训。对于这些来自各县、市的中国农技专家来说，他们没有英、美等国专家那种从发达国家到欠发达国家的优越感，相反，他们有着更多的“同乡”的感觉，与其他国家的专家看到非洲国家的“地方性”相比，中国农技专家更多地看到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似性。^①换言之，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国关系、个人与集体等社会关系的逻辑，也进一步直接影响到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在非洲受援国的实践过程。

五、结 语

超越中国派遣援非农技专家项目来看，中国在非洲农业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是国际社会热烈讨论和有争议的话题，尽管中国一直有着完全不同于传统援助国的援助历史和行动框架，然而直到近期我们才关注到这种差异。^②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曾指出，“我国的对外援助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即“以天下为己任”。这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以我为主、非结构性的天下观。^③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开始进入重新把握这个世界的新时代，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建构完全新型的国际关系。而我们所宣示的“建设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即反映了当今中国世界观的全球视角，表达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文化逻辑。

① 李小云：《中国援非的历史经验与微观实践》，《文化纵横》，2017年第2期。

② Patty A. Gray, “Looking ‘The Gift’ in the Mouth: Russia as Donor”, *Anthropology Today*, Vol. 27, Issue 2, April 2011, pp. 5-8; Emma Mawdsley,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ontributions from Gift Theor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37, Issue 2, April 2012, pp. 256-272.

③ 李小云：《亚投行是中国把握西方的历史性尝试》，凤凰网，2015年5月26日。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非援助与传统援助从形式到内容上存在的本质差别。^① 不容忽视的是，西方人类学者针对非西方社会文化的讨论，其所在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他们的思维、辩证、引据各方面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纯粹的个人，他们不可能从个人的兴趣出发对“非西方”进行评论，他们只能作为西方文化的代理人来“认识非西方”，^②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于中国对非援助的形式、活动内容及内涵等作出客观的理解。因此，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对非援助（包括派遣农技专家项目等）的理解，必须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视角加以审视，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这就要求我们，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亟需意识到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正在发生变化，需要我们从长期作为“客体”、“对象”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的“助手”身份，^③ 逐步进入“主体”的位置来看待中国自身的发展和整个世界，需要从内部重新审视中国自身的社会变迁及其向外延伸的过程。作为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技专家组派遣项目仍将继续。基于我们目前的研究发现，未来如何提高援非农技专家的政治经济待遇、如何实现农技专家的职业化及专家派遣的连续性、如何进一步加强农技专家在促进中国农业技术在非洲的经验分享和转移中的作用，以及提高非洲国家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当地农户生计等重要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责任编辑：吴文成）

① Xiaoyun Li, Dan Banik, Lixia Tang and Jin Wu, “Difference or Indifference: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Unpacked”.

② 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③ 李小云：《亚投行是中国把握西方的历史性尝试》。